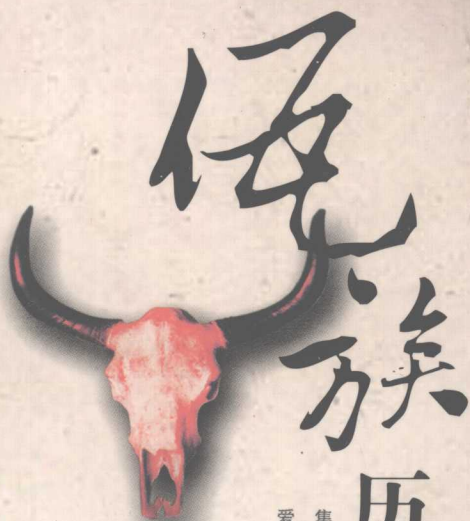




历史文化探秘

集作者三十年之功力成就此书，全书分古史篇 文化篇
爱国篇 人物篇 全面研究佤族历史文化。

段世琳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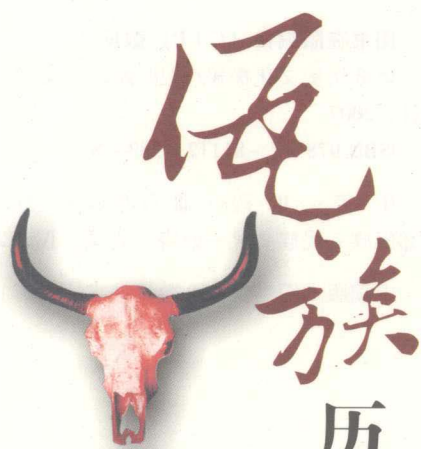


历史文化遗产

——

——





历史文化探秘

◎ 段世琳 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佤族历史文化探秘/段世琳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81112 - 383 - 8

I. 佤… II. 段… III. ①佤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②佤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0008 号

佤族历史文化探秘

段世琳 著

组稿编辑: 柴 伟
责任编辑: 冯 峨
装帧设计: 刘 雨
责任校对: 段建堂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427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383 - 8
定 价: 38.00 元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历史文化探秘



佤族汉子在剽牛



今日西盟佤族木鼓



佤族木鼓舞——“甩发舞”





佤族“舂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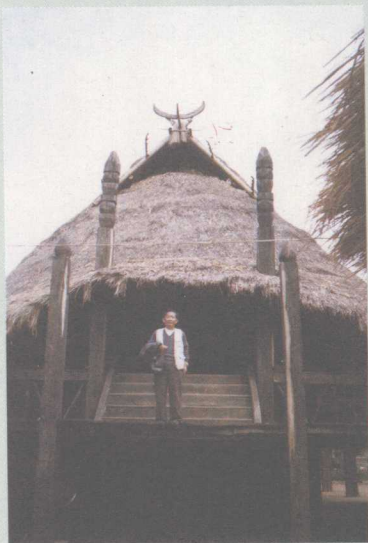


佤族山寨的寨门



佤族村中的寨桩





沧源翁丁佤族村的“佤王宫”一角



作者在班老乡第6次拜访106岁的佤族
抗英女英雄叶南老人



从大西洋彼岸飞到阿佤山探秘的法国博
士白诗薇女士（左）和北京《中国民族》杂
志的记者布饶依露女士（右）





破解佤族历史文化之谜的 重要成果（序一）

凝聚了段世琳先生数十年心血，充分体现他的学术功力与探索精神的《佤族历史文化探秘》一书，即将付梓出版，值得庆贺。在由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西盟佤族自治县于2006年8月举办的“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之推动下佤族文化研究勃然兴起的今日，此书无疑是一项破解佤族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成果，必将引起人们对佤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更多关注。

长期以来，佤族历史文化研究一直处于寥落冷清状态。据笔者粗略估计，如果将欧美、日本以及中南半岛各国的学者除外，当今活跃在学术界专门和旁及佤族文化研究的国内学者，也许还不到20人，其中包括了改革开放以来脱颖而出的多位佤族学者。



在研究成果方面，虽然有前辈学者凌纯声、田继周、罗之基、宋恩常、汪宁生、王敬骝以及佤族学者魏德明（尼嘎）、赵富荣、赵明生、郭锐等相继出版（发表）若干专著及论文，就佤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考古、宗教、民俗、语言等领域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创见，但佤族历史文化研究不仅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许多具开创性的论题尚未触及，而且若干业已涉及的学术问题仍有继续探究的必要。形成此种寥落冷清状态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汉文献资料来看，虽然从商周时期开始直至明清时期都有佤族及其先民古代濮人的相关记载，但资料零散、语焉不详，大多数需要梳理、辨析。虽然已有历史学家对此进行过厘清，但依然歧义犹存，疑点尚多，对一般研究者而言，还难以做到信手拈来，为己所用；第二，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虽有凌纯声、方国瑜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就已开始了佤族社会文化的田野调查，但由于猎头习俗的存在以及交通闭塞等因素的影响，田野调查资料的积累相对不足；第三，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或多或少忽略了传统文化、宗教民俗等领域的资料搜集，而现在则又失去了佤族社会历史及传统文化调查的最佳时期，致使很多重要的宗教、民俗文化资料因未能及时调查而逐渐丢失；第四，更重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众多学者对佤族及其先民创造的文化在云南文化史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中的地位缺乏必要的认识，对作为跨境民族之佤族及其先民与中南半岛乃至东南亚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缺乏应有的估计，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将佤族作为一个“小”民族看待，而且多半只注重佤族文化现状的平面研究而忽略了对其历史发展进程的纵向探索，往往会走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知“小”民族有大课题的误区。在这样的状态下，也就难以开展与国外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与对话，难以形成一支佤族历史文化研究



的学者群，更难以将分散在各地的佤族历史文化学者聚集起来共同深入探讨、研究佤族历史文化的方略及相关论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反思佤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应当说成绩显著但研究空间依然很大。例如，如何以云南文化史为主轴，确立佤族及其先民（濮人）所创造的文化之历史地位；古滇文化、哀牢文化究竟与佤族及其先民有何联系；百濮族系与百越族系的古文化特质有何差异；佤族与东南亚“U”形古文化带的关系如何等。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显然必须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具备多学科理论整合的能力。过去，传统的学科分工亦影响了学者的研究视角，民族史学家关注的是汉文古籍中的相关材料，重心是对这些材料的梳理、辨析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某种学术判断。因此民族史学家很少关注各民族中现今仍存活的古文化样态或文化要素，大多不会去进行田野调查。而民俗文化学家则注重田野调查，关注活形态文化，但大多又缺少娴熟运用古文献资料的功力，往往忽视民俗文化事象的动态结构及历史性特征。如果再加上学术视野的褊狭，不能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审视某一民族的文化或文化事象，就势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既难以辨别泾渭，又难以追根溯源。因此，要脱出孤立地就某一民族文化研究某一民族文化，只停留于浅层描述之窠臼，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者就不仅要具备宏观研究的视野，还应将相关古文献资料、活形态资料结合起来，用多学科整合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去审视、探寻某一民族的历史文化。当然，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涌现出了这样的学者。令人高兴的是，长期从事佤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段世琳先生已在不断的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将古文献资料与存活的文化资料相结合，并辅以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对佤族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路径。

《佤族历史文化探秘》给笔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力图追求理





论创新。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凸显了围绕云南文化史中一些尚待研究的课题这一主轴，深入探寻佤族及其先民在云南文化史中的历史贡献，其路径则是通过现存的佤族文化与相关的古文献资料的比照、分析，试图勾勒百濮原始族系的文化特征。该书探讨沧源崖画的《云南沧源崖画族属试探》等多篇论文以及《国家级耿马石佛洞遗址族属试探》、《佤德语支民族源流之管见》等文，旁征博引，通过翔实的历史及考古资料与自己田野调查获得的活形态文化资料作比照分析、多方考证，不仅提出云南沧源崖画和国家级耿马石佛洞遗址的创造者是古代百濮族系，而且对百濮族系文化特征作了较深入的论述。虽然对该书的某些结论学术界可能仍存在不同的见解，但著者论述得有理有据，给人以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在本书的若干论文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研究者的一个思维指向：汉代以前百濮系原始族群的活动疆域及其文化创造的成果是什么？这也一直是云南文化史研究，尤其是对云南三大原始族系之一的百濮族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虽然段世琳先生尚未对此论题进行专题性的研究，但似乎他的每一个具体研究项目都是在围绕着濮人与哀牢国的关系、濮人及其文化成果在云南文化史中的地位展开的。

其次，《佤族历史文化探秘》试图通过现今仍在续存的佤族传统文化事象，探寻百濮族系之文化源流。云南省现今的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和克木人，其先民就是百濮系原始族群。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等原因，导致了德昂族、布朗族早已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文化转型。因此，相对保留濮人古文化较多、较完整的民族当属佤族。该书收录的多篇探讨佤族原始宗教、民俗文化的论文都体现了这一思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佤族父子连名制考》一文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分析。论文首先援引了《魏书》中的一段文字：“獠者，盖南蛮之别种……种类甚多，散居





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莫、阿段，妇人阿夷、阿艾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以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死者竖棺而埋之……能为细布，色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所杀之人类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以福利……”之后，便对上述文化事象的族属进行辨析，结论是：根据《华阳国志校注》，“獠即濮”。最后，将《魏书》的上述文字梳理出古代濮人之下民俗事象：无姓名，男女称呼按出生的时间先后次序排名；房屋为“干栏式”建筑；族群首领推举产生，称其为“王”，“王”者有二鼓，牛角一对；纺织“兰干细布”（桐梓布）；祭鬼神；猎头习俗。我们则由此看到，以上古代濮人的诸种民俗事象，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仍在沧源、西盟等县的佤族中续存。

再次，从本书所收的论文来看，著者均注重选取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题，或选取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又难以寻求突破的论题。我们当然不能说本书中所有的论文都具有创新意义，然而，著者把理论创新作为自己首要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该书“爱国篇”中的《论“班洪事件”之历史定位——评丹东尼·霍尔教授的一个观点》、《再论“班洪事件”的历史地位——纪念班洪抗英70周年》、《阿佤山区的抗日烽火》、《论佤族“胡家将”在爱国反帝斗争中的历史定位——解读“了不起的民族英雄”》等文以及“人物篇”中的《李定国对开发阿佤山的贡献》、《云南早期杰出的企业家——吴尚贤》、《杰出的佤族抗英名将保卫国》等，其论题大多具有开创性意义。《诸葛亮南征路线与孟获族群考辨——与滇池说、汉族说、彝族说商榷》、《阿佤人的“诸葛”谜》等文，则在学术界似乎已形成定论的景况中提出





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著者重新考证了诸葛亮的南征路线，对孟获的族属亦以新的视角作了考辨，从而得出了孟获是百濮族系的“耆帅”，“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点是滇西”的结论，为破解这一千古之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又如佤族心目中有两个诸葛亮，一为孔明，二是李定国，二者均为汉文化的象征。纵然这些“谜”至今依然还是个“谜”，但是，如本书著者这样执著的探寻者多了，有理有据的新说多了，我们离完全破解这些“谜”的时间就更近了。客观地讲，史学家根据有限的文字资料提出的诸葛亮南征线路即七擒孟获地点之滇池说、洱海说、永昌郡说，对孟获的族属提出的汉族说、彝族说、濮人说，都有相关的资料作为佐证，问题在于如何从多学科的角度对相关资料作出准确的解读。笔者很赞同本书著者在《佤族历史文化探秘·余论》中提出的几个观点，即：第一，史料的占有与如何运用的问题；第二，研究云南地方史，特别是“西南夷”、“南中”、“南诏”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时，应以云南少数民族历史发展演变为主线，注重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三，研究云南古代史，如果对云南地方史籍和大量的文物古迹以及各民族的口碑资料采取“不可信”或视为不重要的态度而予以轻率处理，必然在史学上难以获得较大的突破和取得较大的成果。笔者以为，破解云南文化史中的一些重大的“文化之谜”，确乎既要占有相关史料和在如何运用史料上下功夫，又要将相关史料与存活于民间的相关文化资料进行比照、辨析。从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段世琳先生的研究思路之突出特点是：直击云南文化史中某些交错重叠、纷繁复杂之古文化之谜，力求在前人或当代同行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段世琳先生与笔者神交已 20 多年。他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在艰苦的治学环境中自强不息的探索精神，令笔者十分感佩。1961 年 7 月，他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历史





系，同年便赴当时极为偏僻闭塞的沧源佤族自治县民族中学任教。1984年，调入临沧地区中学任教。1990年，调入临沧地区行署志办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直至退休。在沧源县工作的24年间，他利用教学之余进行了扎实的佤族历史文化的田野调查；调到临沧地区中学和志办之后，除了完成繁重的教学与编纂任务外，他更是潜心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用心捕捉前人及当代同行的相关研究信息，在借鉴前人及当代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寻自己的研究思路 and 方向。从一个中学教师到研究人员这一社会角色的转变，并非易事。这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学科知识结构，学习、接受许多全新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注意捕捉相关研究信息，悉心蒐集相关资料方可奏效。在基层行政单位从事学术研究，其困难程度是研究机构 and 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难以想象的：相关学术资料难以寻觅；如何把握某一学科的走向，尤其是对一些具有前沿性的焦点、难点问题的了解更为困难；缺少与学术界同行的交流与对话、切磋与探讨的机会。有时，还会被某些同事视为“另类”，往往陷入一种“孤独”状态。总而言之，缺少“学术研究的氛围”。然而，段世琳先生闯出来了，《佤族历史文化探秘》的问世就是有力的明证。进入新世纪后，他已经退休，但本书中收入的多篇论文，都是近年的研究成果。而今，他的研究一不是为升学位，二不是为提职称，更不是为名为利，他为的是他近半个世纪生活、工作的这片土地，以及为与他相伴的这些少数民族尽一份义务与责任。自己给自己加压力，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就是一个真诚的老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使命感、责任感的生动体现。如果真有所图，也就是为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俩儿既是同行又是同龄人，每想到他老当益壮，奋笔疾书撰写论文的情景，我常常会发自内心地对他肃然起敬。

本书收入的近40篇论文，撰写于不同的时期，涉及了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文化史、民俗文化学、宗教学、民间文艺学、





考古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难免有个别文章中所运用的理论有些陈旧，有的论证方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有的结论也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收入文集的所有文章在学术层次上亦有所差异。但瑕不掩瑜，《佤族历史文化探秘》不失为一部研究佤族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书。

李子贤

2007年5月于云南大学

P

序

序 (二)

云南省人口 5 000 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 25 个。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数目差别很大,人口在 100 万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彝族、白族、傣族、壮族、哈尼族和苗族;人数不足 10 万的民族,有布朗族、独龙族等 11 个,其他的少数民族如佤族的人数,则在 10 万至 99 万之间。

云南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在高原、盆地、丘陵与高山，人口分布密度较低，各地分布的密度不一；由于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迁徙和移民戍边，形成各民族既杂居又聚居，大部分少数民族既有相对集中的聚集地，又在较大范围内与其他民族相杂居；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相互影响，而且与汉族保持密切的联系。云南省的汉族主要分布在各农业地区，尤以城镇、交通沿线和盆地最为集中，同时与少数民族形成复杂的交错分布。

各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农业地区的发展水平较





高，近代不少地区已有发达的封建经济，少数地区还出现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至于偏远边疆和山区的少数民族，大多滞留在封建农业经济以前的社会阶段，个别甚至徘徊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由于云南各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生产生活方式多样；云南又与诸多国家相邻，因此，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文化有丰富多元的特色，同时体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十分悠久。云南 5 000 人以上的 26 个民族，分别属于氐羌、百越、百濮、武陵蛮等若干古老族群，其中藏缅语族各民族出自氐羌族群；壮侗语族各民族源自百越族群；苗瑶语族的各民族，出自汉代以武陵郡（在今湖南西部）为聚集地的武陵蛮；南亚语系各民族 2 000 年以前定居在云南西南部。除蒙古族、回族和满族分别是元代及清代迁来的外，其他少数民族在宋代以前已居住在云南。汉族在汉代开始迁入，明清时在云南成为人数最多的民族。

由于受生产方式、社会发展程度、文化传统与地理环境等方面复杂多样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可说是种类繁多、多姿多彩。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发展速度较缓慢，一些少数民族过去长期滞留于现代社会某一前期发展阶段，其传统文化较多地保留了该发展阶段的文化形态，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残留了若干社会发展阶段的遗风遗俗及其异化形态。因此，云南少数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不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还具有宝贵的科学研究价值。

人类文化具有的多样性，本质上是人类经济活动方式与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反映。正是在经济活动、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的动态比较与竞争中，人类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并在发展中通过吸收上述多样性所包含的营养，并借鉴其经验教训，有效地校正前进中的偏差，逐步走向人类的未来。可以说，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其经济活动方式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无一不是在不同文化的互动与冲突中前进，并通过文化选择以及新文化的指引而实

